

张伯苓治校与王淑贞持家

■ 郑绩

爱国抗日，未雨绸缪

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是位忠厚圆融的长者，既有经世务实的实干精神，又有人情练达的处世智慧，外忧内患之际，南开作为一个私立学校能够得以保全和发展，张伯苓之功彪炳千秋。

日寇入侵并非突如其来，早就有迹可循，平津诸校包括南开都有心理准备，不少学校在卢沟桥事变前几年就开始逐步往长沙等内陆城市搬迁，南开尤其。早在1934年，张伯苓就在重庆筹备起了南渝中学。

张伯苓未雨绸缪，盖南开之爱国抗日活动已引起日本人注意。南开虽是一所讲究实用的私立学校，但在民族大义上一向争先。1927年，张伯苓在东北考察，亲自感受到“中国之险”，回校即组建满蒙研究会（后改名东北研究会），搜集日本侵华证据。1930年底，张伯苓邀请张学良来校考察，张学良还记得十四年前，1916年时张伯苓在沈阳的演讲，说自己深有触动，自己“所以有今日，亦实南开之赐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南开第一时间反应，成立国难急救会，支持长城抗战，还接收了大批东北流亡学生。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，南开啦啦队在主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打出“毋忘国耻”的标语，全场沸腾。华北事变之后，南开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活动。

因为和东北关系密切，南开早就被日本人盯上，“七七”事变之后几天，日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“先生们，我们就要轰炸南开大学了”。日军正式侵华后，南开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，短时间内就开始了全校迁移，当然，南开的效率也是一向出名的。

1937年7月29日凌晨，天津即将失守，日军在还未完全占领天津的时候，就第一时间炮轰南开，下午再派出飞机投弹轰炸，如此仍不解恨，30日继续炮轰，并派出骑兵和汽车进入校园四处纵火，全校成为火海，未来得及搬走的仪器和图书资料被焚毁劫掠一空，连一口万斤大钟都被抢走。幸而事先已经抢运走三万余册外文书籍，数百册期刊和少量仪器，为以后的联大做了教学基础补充。

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下午，张伯苓在南京向报界表示：“敌人此次轰炸南开，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，而南开之精神，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。”次日，蒋介石约见张伯苓等人，承诺“南开为中国而牺牲，有中国即有南开”。

之后，南开大学与清华、北大合组西南联大，事实上纳入国立体系。张伯苓在西南联大的一次演讲中强调：“我们合不得也要合，不联合便是中国教育的大败。”为避免三位校长同时工作影响西南联大的运作，张伯苓大部分时间待在陪都，花了不少精力管理南渝中学，同时也更深地介入了政治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伯苓的缺席。事实上，在联大时期，张伯苓仍然主持

着南开校务，重大的校务决策在他一人。南开本是张伯苓校长一手培育的私校，校长的权威性与影响力毋庸讳言。南开依旧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作风，不少回忆录都提到联大时期的南开仍然特别重视体育，一边跑警报一边上体育课，在各项体育运动中独领风骚。

联大三校并非完全糅合，从资金、规模、设施、教授及学生数量等各方面来讲，南开在三校间明显处于弱势，然而南开与清华水乳交融，与北大相敬如宾。南开的学生更是以校为豪，在联大内不落风。如果说南开与清华能密切合作，是因为两校的学术人才及行政领导是共同培养出来的，那南开与北大关系融洽，则完全是由于两位校长互相谦让。1941年迁校之议中，联大险些“分校”，是老大张伯苓联合另外两位校长积极居中调停，保证了联大因学术而联合的良好局面。

这一切都表明了张伯苓精于事务、专于教育、长于人事的特点。

独当一面的当家主母

张伯苓不到20岁结婚，原配过门不过数日就病逝，续弦王淑贞，比丈夫大三岁。王淑贞可谓中国传统贤德女性之代表人物，张伯苓对妻子常常不吝赞美之辞。

王淑贞是教书先生的女儿，但她自己不识字，当然也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，但不妨碍日后学生们对这位师母的敬重。刚进门时，小叔只有四岁，她长得如母，常把小叔养在身边。她有四个儿子，教儿只得简单的三条：其一，不许吃零食；其二，不许撒谎；其三，要钱须讲理由。这朴朴素素的三条却有大学大智慧，德智体全在内。西南联大校训“刚毅坚卓”，其中“刚毅”见于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，可近而不可迫也，可杀而不可辱也，其居处不淫，其饮食不溲，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。”细细想来，所要

求的不过这三条而已。

张伯苓办学四处化缘，有钱就好，不问来处，她便和诸位金主的大太太应酬，并不论对方是何身份。钱都花在学校里了，她便随丈夫居陋巷，备不起汽车，最多叫辆人力车。家里开不出伙食，她便上当地。日子过得艰难，婆婆把她的陪嫁首饰偷偷当了，她装作不知。晚年丈夫将所有有名下私校全部捐公，身后房无一间，地无一亩，皮夹里仅余六元七角，她并无怨言。

关键时期，这位家庭妇女亦能独当一面。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前，曾两次亲自登门拜访张伯苓，希望他不要留在大陆，去台去美两可。张伯苓碍于蒋介石支持办学的情面，难以开口直接回绝，是王淑贞出面表示，年纪大了不好挪动，孩子都在北平，学校也在这里，都舍不得，明确表态“台湾我们就去不了”。足可见这位讲究三从四德的旧式女性绝非没有主见。

西南联大时期，这对夫妇已经结婚四十余年。1935年，《北洋画报》上刊登了一对老夫妇的合影，正是张伯苓夫妇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“包金婚”庆祝会的照片。“包金婚”一词是张伯苓自创，取结婚四十年，正在金、银婚之间的意思。

张伯苓说话风趣幽默，很接地气，经常自创一些名词名句。有人提醒他需注意学校经费的来源，不应该收受某些臭名昭著的政客捐款，他答曰：“鲜花何妨臭水浇。”对于南开的前途，他说：“南开南开，越难越开。”说起南开的办学思想，他说“土货化”，其实就是洋为中用改实用之学。说起太太，他更时时夸奖：“就她的常识论，我觉得比读过书的妇女还要高一点。我真幸运有这么一位太太，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，恐怕这一生，我什么也作不成了。”

“这是光荣的事”

丈夫在学校提倡奥林匹克精神，王



▲ 张伯苓、王淑贞夫妇

▶ 张伯苓有“中国奥运第一人”之称，1932年，他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辑第十届世界运动会（奥运会）纪念册题词：“智力竞新，强国之鑑。” 均资料图片

智力竞新
强国之鑑

张伯苓题

第十届世界运动会

淑贞在家也着意儿子体魄。三儿有肺病，在当时原是不治之症，硬生生被她调养过来。另外几个孩子都是体育健将，尤其四子张锡祜，个子特别高，身高接近一米九，性格开朗活跃，是篮球场上的得分高手，撑竿跳中的冠军得主。张家四个儿子，王淑贞持家节俭，一件衣服总是从老大穿到老四，偏老四个子特别高，常对母亲笑嚷，就让老四我先穿新衣服吧，再从老大轮起，也是一件衣服，不也一樣！

百姓偏爱幼儿，这样爱笑爱闹、高大结实的小儿子，怎能不是母亲的心头肉。张锡祜21岁就考进中央航校，毕业后进入空军成为飞行员。1933年2月7日晚间，张锡祜赴南京，参加中央航空学校复试。《北洋画报》报道：“复试为口试，及检验体格。张为华北唯一‘大’青年，当能中选无疑。其父张伯苓校长，其叔张蓬春博士均力赞其行；惟太夫人则多恋恋不舍之意。”众人皆知飞行员之危险，以身许国，乃是定局。航校毕业后生1700余人，几乎无人生还，殉国年龄平均23岁。王淑贞并非无知妇孺，她定然清楚这点，但纵有不不舍之意，她从不提及儿子将来或会如何。倒是张伯苓为此自豪，常常将“殉国”两字挂在嘴上。慈母所挂心者，儿之安危也，不说不提，亦是祈安。

南开遭轰炸后不久，淞沪会战爆发，驻扎江西待战的张锡祜接到命令，飞往参战。临去前，自知此去九死一生，他给父亲写遗书：“儿虽不敏，不能奉双亲以终老，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念！”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，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。……“接信的张伯苓当即在学校向学生们宣读此信，表示“这是光荣的事”。

1937年8月14日，26岁的张锡祜驾第300号轰炸机从江西吉安起飞往南京作战。当时天气预报水平较低，不意遭遇恶劣天气，途中坠落，人机俱亡。首先接到消息的是长子张锡祜，由他告知正在全力抢救南开的张伯苓。出身水师的张伯苓不顾友人在侧，大哭

道：“死得好、死得好！吾儿为国捐躯，可无遗憾了！”

当时张家正在南开诸师生南迁奔忙，是张锡祜的未婚妻张乐民千里跋涉进入敌占区，找到遗骨安葬。张乐民后来仍嫁空军军官，为自己的儿子取名“南开”。

没有人告诉王淑贞，她的幼子已经不在人世。校长幼子殉国，无疑是激励，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奔笔从戎，奔赴战场，更有不少报考航校，折翼蓝天。西南联大八年，培养毕业生3343人，累计入学学生8000人，其中投笔从戎者多达1100余人。学生们临行前，会来校长家告别，这些血气方刚的孩子们是否知道应该避讳，是否曾经说漏过嘴？我们只知道，直到日本宣布战败，大家可以回家了，张伯苓才告诉王淑贞，他们的孩子在八年前已经殉国。王淑贞听到这个消息，回到房间，将自己关在里面许久，之后直到过世，她再也没有提过此事。

联大时期，家家都穷，光靠典当过不下去了，王淑贞索性带着几个教授太太摆地摊。

大历史中王侯将相都来不及亮相，留给王淑贞的空间少得可怜，但这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与南开校风如此相称的校长夫人，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张伯苓曾说王淑贞：“我觉得她最可以称道的，就是她应付旧家庭甚为得体而又不得我知这一点。”面对繁杂事务，能够举重若轻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应付的。王淑贞深谙当家主母之职责，从不推脱维持运转家庭的责任，让张伯苓专心校务即可。

王淑贞从来不在风头上，但坚忍、镇定、从容、识大体，克己复礼这些传统品质令她能够赢得尊重与认可。这种奉献未必不是一种生存智慧，护航她安然度过战争年月。

张伯苓治校与王淑贞持家，内里有许多相似的精神气质。张伯苓没有洋学历，办学洋为中用，王淑贞未受新教育，持家全用旧道德；张伯苓在学校重视体育，王淑贞育儿首重体魄；张伯苓在校事必躬亲，王淑贞从来不用女佣；南开经费全仗化缘，张家用度常靠典当；张伯苓在学校一言而决，王淑贞管家不问丈夫。这夫妇俩，包括南开系列学校，都是不讲花哨，实打实的气质。

回到历史里看那些纯粹的旧女性，设身处地之后，相信会对她们由衷地敬佩钦佩。她们似乎不需要处理那些来自现代性自我的问题，又似乎在不动声色间已经处理好了。

（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）

康德也成
小说主角

■ 编译/黎文

生活如钟表一样刻板的康德，也成为了小说对象。封面还是一只外形直溜恐龙时代的大鸟，鲸头鹳。这种鸟因其巨大的、像鲸鱼嘴一样的喙而得名，主要生活在东非的湿地。鲸头鹳可以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盯住水面几小时伺机猎食，以其沉静耐心深思熟虑的姿态闻名，大概被认为可以象征哲学思考，小说《哲学家的仆人》(Der Diener des Philosophen, Wallstein Verlag, 2024)选择了这只大鸟作封面。

小说以康德身边人的视角，来讲述这位大哲的故事：他的男仆马丁·兰佩，他的秘书埃雷戈特·瓦西安斯基，他的商人朋友约瑟夫·格林。在这部轻松戏谑的幽默故事里，男仆兰佩并不像他初看起来那么愚蠢，他是装傻充愣，用狡猾的手段让大哲现出原形，然后逐渐把他逼疯，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进行着微妙的反抗。秘书瓦西安斯基为了护康德天才大哲的周全，毁了他的结婚计划，后来还写了第一部康德传记。

格林在履行商人职责的同时，要校谈朋友的哲学著作，给出意见与评论，实在是个迷人的人物。

写作这样一本小说来纪念康德三百年诞辰的，是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费利克斯·海登赖希(Felix Heidenreich)。他认为，康德一以贯之地驾驭自己的生活，他的生活显然是为了说明他的哲学主张，再加上背景是美丽的18世纪城市柯尼斯堡，这就足以让他成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。之所以不写成非虚构，则是为了方便发挥，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对话都是基于史料而来。

海登赖希说，当时柯尼斯堡的文化生活活跃到令人震惊。虽然此地不比伦敦这样的大都市，但康德和他的中产阶级们对世界事务极感兴趣。足不出户的康德痴迷于读游记，在课上大加引用。海登赖希觉得这里就指向了启蒙运动的一个矛盾之处：康德说不经别人的引导，而有勇气和决心运用自己的理智，就是启蒙，然而他自己却高度依赖别人转述的波斯人、法国人轶闻。海登赖希还想通过发掘康德身边人物来说明：即使是——尤其是——非常强调个体并声称每个人都独立“超验”思考的哲学，也是在社群中产生的。

康德每天都过得按部就班，不过海登赖希指出，这并不就等同于苦行僧式的生活，康德其实颇享受社交。很多有成就的人物都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像巴赫、巴尔扎克、托马斯·曼等等。严格高效地管理你的生活作息，就能让自己像加满油的机器一样，规律产出。尤其在外部环境不可控时，管好自己就能获得秩序感和意义感。康德有生之年，经历了俄国短暂占领东普鲁士，见证了动荡的法国大革命。海登赖希说，他认为理解康德不是通过纯粹的理论、哲学的“玻璃球游戏”，而也应看到他自己的存在焦虑与彷徨。

1980年，丁玲再次悼念史沫特莱，感叹这位故友临终前排除万难想要回到中国，不料却在英国与世长辞。四年后，中央美院雕塑家张得蒂从史沫特莱为丁玲拍的照片中获得灵感，完成了丁玲生前最满意的一尊半身像，取名“丁玲印象”。今年(2024年)是丁玲诞辰120周年，我们在这尊雕塑的眼中，不仅能看到红色岁月的人影憧憧，还能感受到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期盼，穿透历史，直达未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

文汇报
第597期

文汇报
第597期

1928年，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丁玲“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”，和胡也频从天津出发前往上海。这年年初，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结束了与印度革命领袖维德拉纳特·贾洛帕达的八年感情，计划离开欧洲，前往中国和印度深入革命实践。一次与《法兰克福报》编辑的偶遇，使她成为了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，年底她从柏林出发，由苏联来到中国东北。丁玲和史沫特莱，即将在如火如荼的中国红色革命中相遇。

1931年5月的上海，丁玲穿着一件黑色歌连衣裤，来到格罗希路（今延庆路）的一处花园洋房，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。丁玲是受邀接受采访的，她觉得这位热情的外国记者，是一个近代的热情的革命的实干的平常的美国妇女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前，史沫特莱已从东北途经北平、天津、南京，一路南下来到上海，与左翼人士多有接触。1930年，在鲁迅五十寿辰上，史沫特莱了解到中国红军和秋收起义的真实情况——“那些起义农民在和地主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，像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。”随后冯铿和鲁迅的发言使史沫特莱备受鼓舞，她发现了这些热情的人们有别于北方不食人间烟火的“精神贵族”。翌年3月，因病前往菲律宾休养的史沫特莱刚回中国，就得知了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噩耗。她与胡也频、柔石、冯铿等人早就相识，来往频繁，孰料不多时竟阴阳两隔。丁玲见史沫特莱之前，已将自己几个月的儿子送往湖南老家托母亲照顾，她自己在不同朋友家东躲西藏，想要离开上海去苏区，此时正在等候党组织回复。作为胡也频的生前伴侣接受采访，丁玲本来态度谨慎，但是史沫特莱很快让她打开心扉娓娓而谈，还给她拍了不少照片。其中有一张半身照丁玲保存了下来，成为两人友谊的永久纪念。

两人见面不久后，丁玲接受组织安排留在上海继续左联的工作，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《北斗》，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与史沫特莱一直保持保持着来往，有的大型抗日集会还是史沫特莱通知丁玲参加的，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丁玲在现场避免与史沫特莱等人交谈。只是通过打听到的情况间接确认，“她的确是我们自己人”。

两年后的暮春，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，随后被秘密押解到南京。被捕三年的经历成为笼罩丁玲一生的阴影。因丁玲被捕后生死未卜，舆论哗然，甚至一度传出她已被杀害的消息。史沫特莱此时正是宋庆龄的助手，为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。5月24日，上海《申报》刊登了同盟领导人蔡元培等三十八人的联名电报，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。史沫特莱在丁玲被捕后不久去了苏联，对于自己参与营救丁玲的部分甚少谈及，冯达变节导致丁玲等人被捕一事的记录也只在史沫特莱《汽车：No.1469》等短文中通过他人讲述呈现。但苏珍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显示，除了和伊罗生一起负责《中国论坛》关注丁玲一事动向，已借《大地的女儿》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史沫特莱第一时间参与到营救丁玲的行动。她积极与美国左翼人士取得联系，并召集了一批学者将丁玲的《水》《某夜》等短篇小说译成英文，在《亚

“那一对閃灼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”

■ 曹晓华

洲和美洲》等国际左翼刊物中传播，配合出版丁玲作品集，提高丁玲的知名度，竭力宣传其被捕一事的严重性，以营造有利于释放丁玲的国内外舆论环境。

1934年开始，丁玲先后找到张天翼、曹靖华等人，竭力表达联系党组织的意愿。通过多方努力，丁玲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据1984年中组部《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》，1936年4月鲁迅告诉冯雪峰，听史沫特莱说，丁玲曾想找党组织的关系，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。她在《中国的战歌》中回忆，1936年春季的一个夜晚，她在鲁迅家遇到了“一个以红军党代表身份刚从西北来到上海”的作家……有几个星期，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坐在一起，记录他的谈话，这位“作家”便是中共派往上海的冯雪峰。冯雪峰、周文等人与党组织几经考虑，安排了玲先乘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，随后再赴西安等待时机，由专人护送前往陕北。

几经波折，丁玲来到西安已是秋天。她住在七贤庄一号，等待苏区同志的接应。这里虽挂着“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”的铜牌，实际上是中共为解决红军生器材供应问题的一个中转站，而这个中转站的建立正是史沫特莱一手促成的。史沫特莱在上海找到被希特勒驱逐出境的德国牙医海伯特·温奇，征得对方同意后诊所搬到西安，做了大量的生器材转运和交通工作，一直到西安事变期间海伯特被暗杀身亡（一说被

流弹击中）。丁玲回忆，一天冯海伯要她们多做几个菜，说是有客人要来。她没有想到，客人里一位是埃德加·斯诺，另一位竟是史沫特莱。“我转身望她时，发现了那一对閃灼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。呵，还能是谁呢？是史沫特莱！我急忙扑过去，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，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，我忽然感到一种温暖，我战栗了……”几人的谈话到深夜，分别时史沫特莱拿出一顶貂皮帽，作为践行的礼物送给丁玲，“上面还有她的体温”。

丁玲到达苏区，时在1936年11月初。而史沫特莱这时候则留在西安，从而见证西安事变的全过程，并全身心投入医疗救护工作。1937年1月，史沫特莱也动身前往苏区。当月，彭德怀、任弼时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和主力部队抵达三原，逼近西安，以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。而丁玲则转到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司令部，她很快接到通知前往三原的总司令部，接待一位“外国女记者”。三原县的社里是个古镇，虽接通知，但她并不知道对方就是史沫特莱。直到同样惊喜的史沫特莱和一群年轻人从城门走进，紧紧拥抱住了她，高声大笑地说：“我们坐卡车从西安来，但是你们这里的城门太小了，卡车开不进来！”

西安别后，两人终在红色革命热土再次相见。史沫特莱之前凭借极为有限



文汇报
第597期

的资料写就《中国的红色风暴》，记录下1928至1931年间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。此背景以深入革命根据地，掌握大量一手资料，对史沫特莱而言意义非常。她在丁玲陪同下发表群众讲话，宣扬妇女解放。任弼时希望丁玲陪同史沫特莱去延安，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延安。第二天，两人乘大卡车上北，丁玲记得“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，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，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，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。两天后，我们到了延安”。

史沫特莱在延安十分忙碌，丁玲有时去凤凰山下看她，发现她一早到晚都在不停工作，除了外联，还费了极大的精力在灭鼠运动上，试图改善当地卫生环境。史沫特莱对卫生问题的关注可能也受长期参与医疗救护工作的影响。离开延安后，她先后前往山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贵州等地，在汉口正式开始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。1937年底，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行至山西，又遇见了做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。虽然史沫特莱有时会到西线团来行医送药，但两人多未及长谈，史沫特莱就匆匆赶赴武汉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去了。

西线团一别，两人再也没能见面。

1980年，丁玲再次悼念史沫特莱，感叹这位故友临终前排除万难想要回到中国，不料却在英国与世长辞。四年后，中央美院雕塑家张得蒂从史沫特莱为丁玲拍的照片中获得灵感，完成了丁玲生前最满意的一尊半身像，取名“丁玲印象”。今年(2024年)是丁玲诞辰120周年，我们在这尊雕塑的眼中，不仅能看到红色岁月的人影憧憧，还能感受到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期盼，穿透历史，直达未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

康德也成
小说主角

生活如钟表一样刻板的康德，也成为了小说对象。封面还是一只外形直溜恐龙时代的大鸟，鲸头鹳。这种鸟因其巨大的、像鲸鱼嘴一样的喙而得名，主要生活在东非的湿地。鲸头鹳可以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盯住水面几小时伺机猎食，以其沉静耐心深思熟虑的姿态闻名，大概被认为可以象征哲学思考，小说《哲学家的仆人》(Der Diener des Philosophen, Wallstein Verlag, 2024)选择了这只大鸟作封面。

小说以康德身边人的视角，来讲述这位大哲的故事：他的男仆马丁·兰佩，他的秘书埃雷戈特·瓦西安斯基，他的商人朋友约瑟夫·格林。在这部轻松戏谑的幽默故事里，男仆兰佩并不像他初看起来那么愚蠢，他是装傻充愣，用狡猾的手段让大哲现出原形，然后逐渐把他逼疯，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进行着微妙的反抗。秘书瓦西安斯基为了护康德天才大哲的周全，毁了他的结婚计划，后来还写了第一部康德传记。

格林在履行商人职责的同时，要校谈朋友的哲学著作，给出意见与评论，实在是个迷人的人物。

写作这样一本小说来纪念康德三百年诞辰的，是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费利克斯·海登赖希(Felix Heidenreich)。他认为，康德一以贯之地驾驭自己的生活，他的生活显然是为了说明他的哲学主张，再加上背景是美丽的18世纪城市柯尼斯堡，这就足以让他成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。之所以不写成非虚构，则是为了方便发挥，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和对话都是基于史料而来。

海登赖希说，当时柯尼斯堡的文化生活活跃到令人震惊。虽然此地不比伦敦这样的大都市，但康德和他的中产阶级们对世界事务极感兴趣。足不出户的康德痴迷于读游记，在课上大加引用。海登赖希觉得这里就指向了启蒙运动的一个矛盾之处：康德说不经别人的引导，而有勇气和决心运用自己的理智，就是启蒙，然而他自己却高度依赖别人转述的波斯人、法国人轶闻。海登赖希还想通过发掘康德身边人物来说明：即使是——尤其是——非常强调个体并声称每个人都独立“超验”思考的哲学，也是在社群中产生的。

康德每天都过得按部就班，不过海登赖希指出，这并不就等同于苦行僧式的生活，康德其实颇享受社交。很多有成就的人物都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，像巴赫、巴尔扎克、托马斯·曼等等。严格高效地管理你的生活作息，就能让自己像加满油的机器一样，规律产出。尤其在外部环境不可控时，管好自己就能获得秩序感和意义感。康德有生之年，经历了俄国短暂占领东普鲁士，见证了动荡的法国大革命。海登赖希说，他认为理解康德不是通过纯粹的理论、哲学的“玻璃球游戏”，而也应看到他自己的存在焦虑与彷徨。

1980年，丁玲再次悼念史沫特莱，感叹这位故友临终前排除万难想要回到中国，不料却在英国与世长辞。四年后，中央美院雕塑家张得蒂从史沫特莱为丁玲拍的照片中获得灵感，完成了丁玲生前最满意的一尊半身像，取名“丁玲印象”。今年(2024年)是丁玲诞辰120周年，我们在这尊雕塑的眼中，不仅能看到红色岁月的人影憧憧，还能感受到坚定的信念和深厚的期盼，穿透历史，直达未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



Felix Heidenreich
Der Diener des Philosophen
ROMAN